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六五 ——
(二〇〇四年一月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401b)

【千秋功罪】如何看待毛泽东	李 锐
【春秋史笔】毛泽东为何执掌政权如此不成功?	单少杰
【研究报告】从样板戏看“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造神功能	吴 迪
【影视评论】看凤凰卫视对叶向真的采访	刘晓波
【人物追踪】走出秦城监狱后的吴法宪	张 杰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千秋功罪】

如何看待毛泽东

• 李 锐 •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办的毛泽东诞辰 110 周年学术讨论会于 2003 年 12 月中旬在美国波士顿举行，主题是重新评价毛泽东在人类发展史中的作用。曾担任毛泽东的秘书的李锐先生受到邀请但没有前去参加，写了这个发言稿。)

对毛泽东的评价，在他生前当然是无比崇高。一曲《东方红》唱遍全国城乡。林彪更给他上了“四个伟大”的尊号。“文革”十年中对他的崇拜已如宗教圣主。可是，他辞世刚四年，即经全党四千高层干部讨论后，通过了党的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尽管《决议》说，“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但总是以党的决议形式，正式提出他犯有严重错误这一问题了。要知道，毛去世前有过“我生平做了两件大事”的遗言，就是担心有人翻“文革”之案。

我曾说过，这个《决议》是研究毛晚年错误的开始。近二十年来，国内外有关毛泽东研究已获得丰硕成果。比较地说，因未受到监控，境外的出版物成果大，即数量少而质量高。如美国的施拉姆、史华兹、麦克法夸尔、索尔兹伯里诸位学者的著作；以及中国的高华、单少杰、

王若水（还有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中有关毛的论述）等人近作。境外有将希特勒、斯大林与毛泽东相提并论，称为二十世纪三大独裁者，还有干脆名为“混世魔王”的。我认为历史学者应当做的并不是道德的谴责，而是弄清历史事实的真像，进而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关于毛一生功罪，我说过三句话：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这当然是很笼统的说法。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毛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夺取政权和执掌政权。据老中宣部长陆定一的说法，毛做前一件大事，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做后一件事，三分成绩，七分错误。我可以补充一句中国古人忌讳之言：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即以暴力夺得革命的胜利，仍以暴力（阶级斗争）执掌政权是决不可行的。暴力即有死人的问题。毛是决不怕死人的，死多少也无所谓。内战时期的肃反，从打A B团起，自己杀自己人死了十万。不总结教训，延安继续搞抢救运动，总算提出“一个不杀”的方针。不怕打核大战，说中国死了几亿，还有几亿。“大跃进”饿死四千万人。历次政治运动伤害了几千万人，被迫致死几百万人。叶剑英说过，“文化大革命”死了二千万人，整了一亿人。这些数字难道不可怕吗？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我们弄清楚了吗？

毛青年时代就信奉斗争哲学，留下名言：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认为所行只对自己负责。从事革命后，他接受了中国农民革命传统中的痞子精神（这种精神贯穿到“文革”的“造反有理”，发动红卫兵运动）。不同的是，他追求“君师合一”，又当秦始皇又做孔圣人。他的《沁园春》词道出其中深意：“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1945年到重庆和谈时，这首词风靡大后方，征服了许多人。他的文章、风度、谈吐，他的博古通今，无所畏惧，确实独具魅力，使人甘拜下风。在战争年代，在“三座大山”压迫之下，他审时度势，基本做到了实事求是，《新民主主义论》是他的理论高峰。延安整风运动使他成为党的绝对权威。执掌全国政权之后，“三座大山”消失，更要以“毛泽东思想”来征服天下。1950年颁布的“五一节口号”，最后一个“毛主席万岁”是他自己加上去的。于是天下归心，君师合一，惟我独尊，一言九鼎。尤其斯大林问题出来之后，更是无所顾忌，我行我素，更不容拂逆，而一意孤行了。与天地斗的“大跃进”，明知出现了错误，但皇帝决不能下“罪己诏”，还在会议上正式提出：“要一点个人崇拜。”林彪逢迎投好：大讲“四个第一”，只读“老三篇”，身上挂像章，手摇小红书，“一句顶一万句”，高呼万岁、万万岁。

毛泽东非常相信统一意志在两军厮杀中的作用，没有服从就没有军队。他不熟悉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对民主的理解也只认为是一种手段，“要让人家说话”，不过是恩赐而已。他需要人人都听命于己，都做驯服工具；可说并不懂得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扼杀不同意见必导致思想停滞和僵化。他晚年爱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是对左右和掌权者说的，殊不知正好讽刺了自己：过去受“三座大山”压迫时最聪明，一朝君临天下便愚蠢了。他觉得知识分子有点知识，有思考的习惯，难免遇事多嘴多舌，影响号令施行。于是延安整风运动得以发展，从批胡适，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一直折腾到“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以至说道：“书读得愈多愈蠢”，“知识越多越反动”。于是，青年学生统统赶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愚民政策得以风行。终于使得人不成其为人，历史倒退下去，经济到达崩溃的边缘。还记得毛当年说过，“大学还是要办的”，却明白宣称仅仅限于理工大学。其意即在坚船利炮的器物层面得抓紧，研究“两弹一星”的技术人员还是需要的，而不再要培养人文知识的文科大学了。

由此可见，不实行民主法治，权力不受制约，文采武功不亚于历代雄主明君的毛泽东，让其一意孤行，可以荒唐到何种程度！所以我信服西方这相同意义的词语：个人崇拜即邪教也。

我早在文章中说过，毛泽东的阴影还笼罩着我们。这就是说，我们过去的弯路，除了毛本人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的原因。在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问题之后，毛说过，如果在英美这样的国家，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英美民主法治的国家，任何人都不能违宪，政治家都必须遵从选民的意志，也没有不受制约的权力，当然不可能发生斯大林式的独裁暴政。

毛对此是有所认识的。可是他摆脱不了“马克思加秦始皇”这双重权威，尤认为“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不能丢”；也就是摆脱不了一生的自我成见。他最后做到了十年“文革”，想以此达到他的理想（实为幻想），这是中外古今任何一个专权执政者都做不到的，只有自诩为“马”加“秦”的，即接受并发展了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且继承了中国自古专制传统的毛泽东才能做到。因此，毛泽东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一生，关系历史太大，值得我们弄清全部事实，仔细加以研究。

邓小平曾是毛泽东的爱将。他比毛高明，坚决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当他作纯理性的思考时，也能认识到没有政治体制的同步改革，经济的改革开放也是难以成功的。可是在实际运作之中，仍离不开独掌权力的惯性，他没能实践自己的这一认识，反而发生1989年的风波。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的阴影还是何等的顽强。人类历史发展的遗憾太多了。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要将历史及其有关人物的事实，尤其是长期不为人知的事实，一一清理出来，公之于世。从而使后人彻底清醒过来，接受教训，以史为鉴，更理性地前进。我们要学习司马迁的春秋史笔，决不要再遮遮掩掩过日子。

~~~~~

### 【春秋史笔】

毛泽东为何执掌政权如此不成功？

• 单少杰 •

毛泽东所执掌的政权，无疑是“暴兴”的，即通过暴力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硬打出来的。那么，它是不是“速衰”的呢？答案似是肯定的，这一政权也是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衰落下去的。当老人家去世时，他的国家也随之濒临“崩溃的边缘”（中共中央文件语）。

毛泽东就创业来说，可与中国史上一些较成功的开国君主相比；但就守成而言，恐怕要跌入其间较差的等级。他既做成平地高楼，又弄得大厦将倾。

1949年，毛泽东终于走完了千山万水，由西柏坡进驻北京城，并于群英簇拥中登上了天安门，可谓荣耀之至。

据其卫士回忆，当时，像柳亚子、李济深“这些民主革命的老前辈们见到毛泽东，都习惯做一个动作，竖起大拇指，轻轻晃动着夸耀毛泽东。那时听到的最多的话是‘真伟大’，‘最伟大的人物’，‘真了不起’，‘打遍全国无敌手的军事家’，‘我们都是经历过几个朝代的人，没有哪一个朝代的人能跟毛泽东比’……”说这些话的老先生们，大多是那个时代的所谓名士，大多有些傲骨，在历史上或有过不买袁世凯账的纪录，或有过不听蒋介石话的举动。他们过去不愿攀附权贵，如今也不会一下子变得很世故、很会巴结人。他们赞誉毛公当是发自内心的。

可问题是，他们说话时所站的位置恰好是毛泽东在事业上的转折点，他们只能看到其创业已经走过的路，而未能看到其守成将要走出的路。若只看到前者，确能使人产生敬畏感。因为，毛赢得的是，中国史上最大规模、最为艰辛的战争。但若再看到后者，再看上一些年，又将会使人产生什么样的感受？还能不能继续保持上述敬畏感？

若再看上七八年，看到几十万最爱说话的知识份子却被封住了嘴巴，被打成了“右派”，他们就会发出此主席真够厉害的感叹。因为，这是他们所熟悉的那位蒋总裁也未曾做到的事。国民党执政时的耳根远不如它的后继者来得清静。当时，人们在大众传媒上还不时能看到鲁迅等

痛骂论敌的文章，在大学课堂里也不时能听到李达等讲授马克思学说的声音。

若再看上十来年，看到几千万种粮食的农民却因没有粮食吃而被饿死，他们又会生出此主席确有罪过的想法。因为，这是他们在满清时期、民国时期、甚至日本侵华时期都未曾看到的人为性大饥荒。若再看上一些年，看到那场殃及数万万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就会觉着此主席做得太过份了。因为，这不正是他们未曾经历的国耻国难，而且是他们闻所未闻的国耻国难。

那么，毛泽东为何在“暴兴”后“速衰”？为何在执掌政权方面如此不成功？对此，亚里士多德的那个“后半截子文章”似能提供某些解释性思路（就其抽象意义而言）。

亚氏在考察一些像斯巴达那样的尚武城邦的历史时，指出它们大都犯了一个本末倒置的错误，即把它们的手段当做它们的目的。“人生包含不同的方面—勤劳与闲暇，战争与和平”，其中，“战争只应是导致和平的手段，勤劳只应是获得闲暇的手段”。人们进行残酷的战争本应是为了获得安定的生活，进行勤劳的工作也只应是为了享用优裕的时光，并最终使人们能在一种恬然自足的环境中从事理性思考即“沉思”（亚里士多德认为“沉思”能充份体现“智慧”这一人类的最高美德，故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我们一再申明的是享有优裕闲暇的时光是全部生活的目的。”

可是，斯巴达的“立法家们以战争和克敌致胜为其政治制度的目的”，“整个国家制度都是以战争事务为其目的”，从而把本应做为手段的东西当成了目的。斯巴达人只重于战争训练，只长于好勇斗狠，结果使他们在战争胜利后不能适应和平的生活，长此以往也就不能保住自己通过暴力而获得的东西。

诚然，亚氏所说的人生内涵与后人所理解的人生内涵不尽相同，古希腊自由民享有闲暇的方式与现代公民享有闲暇的方式也有很大区别；但他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值得后人借鉴的思想：在人生的追求中或在国家的崛起中，不应把人们所凭借的东西当作人们所追求的东西，不应把其奋斗的手段当做其奋斗的目的。

亚里士多德对斯巴达这一批评似也适用于毛泽东。后者崇尚斗争，以至于把它作为人生的一种追求。他曾说过一句名言：“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就把斗争当做他人生的一大快感，一种理想境界。他讲哲学也是大讲斗争性，认为斗争性贯穿于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中，是无条件的、绝对的。世人也因此将他的哲学恰如其份地称作“斗争哲学”。

当处于强大敌人压迫下，当处于在野党地位上，毛强调斗争尚可理解。因为，不斗争则亡，不斗争则不能夺得政权。斗争在这里只是作为维护自己生存需要的一种手段，只是作为实现自己权力目的的一种手段。

可是，当已经打败强大敌人乃至消灭他们人身存在时，当已经获得全国政权并且得到大多数人认可时，他还要斗、还要把斗争看做是高于一切的事业，就没有道理了。这时，他应该做的主要工作不是革命、不是与人相斗，而是建设、而是与自然打交道。

事实上，他执政后所革的命、所斗的人，大多是他不应该革的命、不应该斗的人。因此，这种斗争的实际意义，已不在于斗争什么对象，而在于斗争本身。于是，过程本身上升为目的，斗争成了“游戏”。一切游戏的特点，就在于目的即过程。

然而，这种“游戏”并不好玩，相反很是残酷。五十年代“反右”，斗了几十万知识份子，后来又给其中99%的人宣布平反，说是搞过火了。六十年代“文革”，又斗了几百万老干部，后来又把他们中绝大多数的人宣布解放，又说是搞过火了。这是反反覆覆以一种十分严肃的态度做着一些颠三倒四的事情，很像是一种“游戏”、一种幽默，一种全然黑色的幽默。没有几个人能就此笑得出来，即使有笑，也笑得毛骨悚然。不过，老人家倒有可能从中感到生活的充实，进而达到他的“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境界。

这一“游戏”本质上是整人的，并且是大规模整人的。由于处在执政者的地位上，毛与人相斗实是强者对弱者的随意处置，即对后者可以采用包括批判、羞辱、关押、刑讯、枪决在内的任何手段。又由于具有被神化的个人权威，毛的任何整人举措都能获得广泛的响应，甚至能搞成一场波及全国的“运动”。他不斗则已，一斗即整；不整则已，一整便动之于天下。

毛泽东“斗”了一生，也“乐”了一生；只是乐了一人，苦了众生。他前半生斗了许多确想伤害他的人，斗得多少有些情理；后半生则斗了许多不想伤害也无法伤害他的人，甚至斗了许多相信他并支持他的人，斗了许多爱他胜过爱自己的人，斗得就大谬不然了。亚里士多德还从正面考察了一些像梭伦那样的执政者的政绩，指出他们突出的贡献，就在于积极制定各项法律制度，并严格依据法律进行统治。因为，“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是衡量事物是否合乎正义的尺度”，“法律的统治优于个人的统治”。反之，“让某一个人来统治，就会使政治带上兽性的成份，因为他的欲望有时会支配他，他的情感会影响他，即便是最贤达的人也在所难免。而法律恰恰能免除一切情欲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对梭伦等的这一赞誉，似也能反衬出毛泽东的一些问题来。毛执政后未能很好地实现由社会革命者角色向社会建设者角色转变，不注重制度化建设，而总想不停顿地变革。他也曾搞过一些制度化东西，但随后又去破坏它们。他总是在“破”，不只是破前人的规矩，也破自家的规矩。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是既要变革旧世界已有过的东西，也要变革新社会刚建立的东西，比如，要砸烂“公检法”，要打破各项规章制度对革命群众的“管卡压”。

即便在日常生活中，他也不守规矩。据其卫士回忆，他过的日子常常不是大家都过的一天24小时，而是根据其特殊生活习惯安排的一天28小时，即所谓“毛泽东的一天”。他散步常常不走现成路，而是踏石踩草想往那儿走就往那儿走。他的身上似有一种天然的反成规反秩序的倾向。

毛泽东这种行为方式，正如他自嘲的那样——“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比较适合于打破一个旧世界，但不适合于建立一个新世界。

□ 摘自单少杰：《毛泽东执政春秋》

## 【研究报告】

### 从样板戏看“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造神功能

• 吴 迪 •

在西方，电影一方面是受市场规律支配的商品，“另一方面，由于是体制中的物质产品，影片也就成了这种体制中的一种意识形态产物。”〔1〕在中国大陆，电影的属性一度完全被规定为宣传品，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的工具，因此它只有意识形态的产物这单一性质。在1949年至1976年间这一特点表现得至为明显，八十年代以后好了一些，或者说隐蔽了一些，但

在根本性质上并未改变。中西比较，可以说，西方的电影重人性，中国的电影重党性；西方的电影讲故事，中国的电影讲政治；西方的电影走市场，中国的电影走官场。而最能体现这些中国特色的莫过于摄成电影的样板戏。

如果说新中国的电影是一个意识形态展销会的话，那么文革前十七年的电影就是其中的优质展品，而样板戏电影（以下简称样板戏）则是这些优质产品中的精品荟萃。作为精品，样板戏汇集了大陆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体现在电影的主题、题材、风格、思想情感等诸方面。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是一种否定性概念，它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具有实践性、意向性、虚伪性、滞后性、继承性等基本特征；而虚假性是核心、要害。（2）“意识形态本质上是编造幻想，掩蔽现实关系的精神力量，是对社会现实的颠倒的、神秘的反映。”（3）本文将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为出发点，借鉴西方现代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样板戏的“造神”功能做一初步分析。

由于“造神”并非仅仅存在于样板戏之中，所以在必要时，我将不得不提到那十七年中拍摄的其他电影。又由于这些思想情感与毛泽东时代的政经体制有密切关系，所以在本文的讨论中必要时会提到一些电影之外的事。这种溯本求源的工作虽然并不讨人喜欢，但是欲说明意识形态的作用，则非如此不能竟功。

样板戏从舞台到银幕统治了中国不止十年，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表现国人对毛之忠、对党之爱。这是文革中及文革后的主流话语对样板戏的共识。而这前后两种共识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认为，这种歌颂和表现反映了时代的最强音（4）；后者则认为，这种歌颂和表现是政治强加给艺术的，它将毛泽东塑造成了神，推动了“造神运动”。（5）

#### ◇ 为何要“造神”？

这个问题极其庞大复杂，涉及到八十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本文只能从意识形态方面粗略地勾勒一下“造神”的原因和历史。简单地讲，“造神”是出于需要——政权和国家机器的共同需要。为了夺取并巩固政权，为了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用阿尔都塞的说法——即“强制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the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6），就需要用一种主义统一全党，需要一个偶像统率国民，需要一种思想整合国内各地、各民族。在这种现实合理性之中包含了“造神”基因。

“造神”并非自样板戏始，也远不是样板戏所能完成的。以年鉴派史学的“长时段”观点看，“造神”早在延安时期就开始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首陕西农民李有源写的歌就是通过延安的宣传机器广为传播的。这种来自翻身农民对领袖和党的感戴之情，与统一全党、统率国民、整合国内各地、各民族的意识形态需求结合起来，成了解放区的统治思想。

1949年以后，随着新政权的建立，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更加强大、高效且完善，在它控制下，所有的传媒和文艺作品都程度不同地承担起歌颂领袖和党的任务。尽管权力高层对个人崇拜还保持着一定程度的警惕，但是意识形态机器并未因此而减少对党和领袖的歌功颂德，造神所需要的群体心理和社会舆论在这种歌颂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五十年代后期，毛泽东开始自我膨胀，从反对个人崇拜转向提倡个人崇拜。（7）于是意识形态机器就越发变本加厉起来。在此前后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事件——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1962年的中苏论战——使毛泽东越来越陷入焦虑之中，担心党内出了修正主义，怀疑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自己身边……。于是，阶级斗争日益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党内斗争浮出水面。权力之争与主义之战都

需要树立个人权威，在权力高层的默许和毛的怂恿之下，林彪等人迎合上意〔8〕，使“造神”运动迅速升级。1970年，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斯诺说，“四个伟大”“很讨厌”的时候〔9〕，他的神祇地位其实已经固若金汤，无可动摇了。

简扼地说，四十年代为“造神”提供了舆论，五十年代为“造神”奠定了基础，文革前为神塑了金身，文革中只剩下了全民的顶礼膜拜。样板戏产生于六十年代初期，经过江青等人的指导，在“造神”方面又更上了一层楼。但在文革前的文艺作品中，它们不过是“造神”运动中的一员，只是因为成了样板、并且统治了中国十年，所以才格外引人注目。

#### ◇ 样板戏如何“造神”？

样板戏“造神”靠的是意识形态的异化功能。其理论前提是，社会主义存在着异化。“所谓‘异化’就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而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或支配主体本身。”〔10〕文革后，痛定思痛的周扬在一篇文章中对此做了这样的概括：“在经济建设中，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必然王国，过去干了不少蠢事，到头来是我们自食其果，这就是经济领域中的异化。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至于思想领域的异化，最典型的就是个人崇拜，这和费尔巴哈批判的宗教异化有某种相似之处。所以，异化是客观存在的。……〔11〕

样板戏把领袖和政党异化为神，是通过三个层面完成的。从自然生物层面来看，样板戏首先是把毛和党异化为一切生命依赖的对象——太阳。因此，太阳及与太阳有关的自然现象——曙光、朝霞、黎明、春风、雨露等都成了毛与党的象征。于是，有了“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这样的曾经人人每天必须唱的官定颂歌；而《智取威虎山》剧中的杨子荣，要“胸有朝阳”才敢于上威虎山会见土匪；《红色娘子军》里，面对枪口的洪长青必须引吭高歌：“洒热血迎黎明，我无限欢畅，望东方已见那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阳”，而找到了红军的吴清华就必得以泪洗面：“想不到今天哪，春风引我到这里，找见了救星，看见了红旗”；《白毛女》中的大春、白毛女报仇雪恨后，山洞外的一轮红日就随即冉冉升起，全体演员合唱“太阳出来了”……。这类直露笨拙而屡见不鲜的声画语言，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毛和党是生命之神、造物之神、解放之神，是中国人民的上帝、佛陀和真主。在这一最高的自然神面前，革命干部也罢，英雄模范也罢，人民群众也罢，都仅仅是某种有意识的生物体。

从人伦情感层面看，样板戏将毛和党（有时党的军队被当作毛和党的代码）异化为“亲人”和“恩人”，再由“亲人”上升为“父母”、由“恩人”上升为“救星”。《平原作战》中的张大娘为保护党员李胜被日军打死后，其女儿小英在红高粱地里边舞边歌：“下岗来修地道敢把山移，母亲的热血浇灌了战斗的土地，仇恨的种子开花结果定有期。共产党是亲娘将我培育，革命的军和民红心相依。立壮志做一个中华好儿女，树雄心高举抗日红旗。”〔12〕这一情节典型地表现了将母亲置换成党的叙事策略。毛和党对于个体来讲是救星，对于集体来讲是“人民的大救星”，对于共同体来讲则是“民族的大救星”。也就是说，一方面，样板戏将领袖与群众、执政党与“选民”之间的政治关系诠释为血缘关系；另一方面，将执政党及其领袖为夺取政权（武装斗争）、巩固政权（阶级斗争）所做的一切努力称为对人民的恩赐。通过这种宣传手段，执政党与选民、领袖与民众的政治关系，就被转换成了拯救者与被拯救者的施恩——报恩关系。

就社会政治层面而言，样板戏将政党及其领袖与人民的关系异化为主一仆、君一臣关系，每一部影片都竭力表现干部、群众对毛和党的无限忠诚和无条件顺从。这种影像语言透露出的信息是：在当家作“主人”的中国人民头上，还有一个真正的主人。所谓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谎言，一个意识形态机器制造的假象。中国人仍旧像其祖辈那样跪拜在

一个至高无上的君主面前。与帝王时代不同的是，这个“现代君主”既是意识形态机器的杰作，又是国人不可须臾离开的靠山。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序言中指出：“人们迄今总是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的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模范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他们头脑的产物就统治着他们，他们这些创造者就屈从于自己的创造物。”（13）样板戏所揭示出的创造者与创造物、君主与臣仆之间共生共荣、相互依存的关系，为“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增加了一个精彩的注脚。

任何意识形态都不是空中楼阁，新的意识形态总要从旧的意识形态中选择那些与自己的价值取向相符的内容，加以改头换面后继承下来。马克思在谈到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时指出：“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14）新中国从母体中带来的不是资本主义，而只能是封建主义。于是，很多与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同形同构的封建观念，不露痕迹地渗透到了样板戏之中。中国传统伦理格外强调儿女对父母要“孝”（孝顺恭敬），被施恩者对施恩者要“义”（知恩图报），臣民对皇权要“忠”（生死不渝），在平时这种“忠”表现为完全放弃自我的绝对服从，在关键时刻则表现为不惜献出生命的“节”（死生在此）。

现代的样板戏把这些封建伦理情感与意识形态有机地揉在一起了。《白毛女》中有两组两极镜头：“一组是送大春走，一组是迎大春来，前者又是后者的铺垫，遥相呼应，使后者迎的含义更为深刻和鲜明，乡亲们的迎，是在倾吐对恩人共产党、八路军的衷心感激，是在欢呼向往了多少年、多少代的翻身解放终于来临。……”（15）影片的结尾是，感恩戴德的乡亲们决心永远跟着毛主席，永远跟着共产党。在《智取威虎山》的第八场戏中，“当（杨子荣）唱到‘抗严寒化冰雪我胸有朝阳’时，顿然间霞光四射，彩云万朵，一道灿烂的晨光，染红高耸入云的峭石之尖，与‘东方红，太阳升’的旋律相映生辉……”。（16）《海港》中的“战斗动员”一场，……“用两个互相呼应的大唱段，揭示出方海珍对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精神深刻理解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无比忠诚，……”。（17）剧中方氏之忠与皇权之下的臣民对皇帝之忠并无本质区别。《红色娘子军》中，作为“无数革命先烈的代表”（18），洪长青面对敌人的枪口“向毛主席、向党、向人民表示：‘我为你而生、为你而战、我为你闯刀山踏火海壮志如钢！’”（19）这里的“人民”其实只是陪衬，洪长青死节的是党是毛。……这类的例子不胜枚举。意识形态宣传的高明和贡献就在于此，在扫除封资修的腐朽思想、建立无产阶级新文艺的旗帜下，它将潜藏于国人意识深处的封建文化的精髓——“忠”、“孝”、“节”、“义”——与时代精神融合在一起，成为统治阶级思想的重要组成部份。

有论者批评样板戏中的角色都是孤男寡女，是主张禁欲主义。其实，禁欲是为“忠孝”而存在的。既然毛和党成了子民的“父母”，那么“儿女”就只有放弃性才能真正地尽“孝”。换言之，新的“三纲五常”产生了新的“父权”，全心全意地尽“孝”就必须弃绝性交。从这个意义上讲，样板戏中的那些“高大全”的英雄，与古代为父母守孝的孝子并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古时的孝子为死人尽孝，而现代的“孝子”则是为活人和一个现存的组织尽“孝”。

弃绝性交是现代尽忠尽孝的最高境界，它的意识形态依据是“与一切个人的私心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那十七年的电影的一个基本主题就是：放弃个人，回归集体。在这一点上，极左与极右这两种意识形态取得了共识——墨索里尼在《法西斯主义学说》中宣布：“法西斯主义的精神上的基本态度是树立忘私的生活准则，把斗争视作积极生活的标志。”（20）从十七年的电影到样板戏，从样板戏到主旋律，革命者的标志就是“公而忘私，高举集体主义、国家主义的大旗”。在电影《芙蓉镇》里，肖涧秋只有投入到时代洪流中，而不是象小说描写的那样迷惘绝望地逃出芙蓉镇，才符合时代精神；电影《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只有离开自私自利的余永泽、投身革命才有前途；电影《李双双》里的喜旺也是回到集体之中、向人民公社献上爱心



之后，才得到了妻子李双双的爱情；为电影《雷锋》所歌颂的这位战士，也是因其心甘情愿地当一个革命机器上的螺丝钉，才成了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电影《红色娘子军》中，琼花与洪长青只有放弃爱情，才能确保影片的思想主题。（21）剧中角色高中毕业生韩小强只有放弃当海员的理想，与装卸工为伍，高高兴兴地一辈子扛大个，《海港》才具备样板的资格。按照上述意识形态的要求，与十七年的电影相比较，样板戏中正面人物的情感世界，尤其是婚姻爱情状态几近零度的表现，是一个大大的进步。

自然生物、人伦血缘、社会政治，这是样板戏“造神”的三种途径和三个层面。通过这样一番改造，普通干部群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就被定格为匍匐于政党一领袖之下的低级生物、孝子贤孙和臣工奴仆；同时，这些失去了自我、失去了做人的资格的人们——无论他们是样板戏的观众还是样板戏的主创者，却被引导着在想像中以独立的个体自居，以国家的主人自命。“意识形态是以一种在个体中招募主体（它招募所有个体）或把个体‘改造成’主体（它改造所有个体）的方式并运用非常准确的操作‘产生效果’或‘发挥功能作用’的。”（22）样板戏为意识形态如何利用主体类型的功能，将“具体的个体询唤成具体的主体”（23）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

“九尺之台，迟于累土。”其实，电影中的“造神”早在1949年新政权刚建立时就开始了，新政权下的首部故事片《桥》就在这方面有大胆表露和赤裸裸的迎合：“编导摒弃了那种对人物强烈的突出和夸大的表现，采取的是朴素、亲切、平凡而又真实的表现手法，描写了工人阶级在斗争中的壮大与成长。当影片进入尾声，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起来的时候，便自然、真切地出现了老侯提出的加入共产党的请求和‘毛主席万岁’的高呼声这一使观众激动的场面。”（24）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更没有神仙上帝”。神来自人们自身，是人类自造的幻像。造神有一个基础，在千年封建统治和新型意识形态的土壤之上，“加入共产党的请求”孕育了“党是母亲”的雷锋精神；“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导致了“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的臣民祝福。造神有一个过程，一个由微而著、由量到质的过程。谎言说了一千遍就成了真理，“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了十几年就成了“早请示、晚汇报”。就意识形态而言，中国十七年的文艺史就是一部“造神”史，而电影是先锋，是闯将，是榜样，是“巨无霸”。

当然，如果没有十七年电影的培养，这个“巨无霸”其实是无从生长的。《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对此做过精彩的论述：透过新中国电影，我们看到社会的进步、革命的成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指路人毛主席、共产党。由于当时毛主席健在的缘故，故事片中没有直接出现这位领袖的形像，然而，毛主席的肖像、语录在影片中随处可见、可闻，有时这些肖像、语录或最新指示成了影片情节发展的最主要契机，矛盾的转化和解决直接由这些因素来决定。我们经常能看到影片主人公在关键时刻挑灯夜读毛主席著作，凝视毛主席肖像，或者是大段背诵毛主席语录的场面。……

陈荒煤在1961年对电影创作人员的谈话中曾举过这样两个例子：“最近有两个军事题材的影片，描写一个普通战士，在抗日战争初期，甚至在1927年革命战争时期，都能够背诵毛主席关于革命战争的战略思想。这是不真实的。”“有个片子随便把《毛泽东选集》四卷中的许多话加到一个战士身上，军队要撤退，这个战士马上说：‘要大踏步后退，不在一城一池之得失。’这些话都对，但是看了不舒服，因为不真实。我们作品中这样的情况还不少。”（25）生硬地将《毛选》四卷的思想附加到一个普通战士身上，甚至表现为在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形成之前军队战士就对它耳熟能详、了如指掌了，这并不是个忽视了真实性的问题，而是由于影片创作者过于热切地想告诉观众，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如何正确地深入了人心。因此，在这些电影中，毛泽东既是个不出场的形像，又无所不在。当然，在十七年的电影中，党同样是一个不出场又

无所不在的形像。

十七年拍摄的大多数影片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造神”倾向，它们为样板戏的诞生提供了肥沃丰厚的土壤，样板戏不过是把文革前十七年的叙事模式和视听语言推到了极致。尽管文革后样板戏不再吃香，但是火尽薪传，新时期的主流电影——尤其是“献礼片”和“获奖片”——仍然在潜意识中承袭了样板戏的精神余脉；只不过出于策略，它们又回到了政权建立之初的电影宣传片的鼻祖，回到了《桥》那里去。现在，《东方红》所传达的思想情感仍旧控制着传媒；在不久前获奖的影片《离开雷锋的日子》里，主旋律也仍旧是“唱支山歌给党听”。〔26〕虽然进入二十一世纪了，“造神”并没有完全终结。

#### ◇ 样板戏“造”的是什么“神”？

几乎所有的论者都认为，样板戏所造之神只有一个——毛泽东。这个说法显然也是“意识形态之蔽”的功劳。事实上，样板戏造了两个神——毛泽东和共产党。确切地说，这是一个两面神，其一面是毛，另一面是党；毛与党是一体的，他们是无法分开的连体胎儿，毛不过是党的代表，是党的具体化而已。或许会有很多人出于各种目的反对这一结论。但是，对此论持异见者似乎很难否定这样三个问题：其一，在上面所说的自然生物、人伦血缘、社会政治三个层面中，哪一个层面没有党？其二，如果没有党，毛能单独成神吗？其三，离开了党，会出现这样的样板戏去制造毛之类的神吗？

或许，结构主义叙事学有助于我们看清这个神的真实面目。用代码与功能的规则来分析样板戏，就会发现，除了一般故事片的代码——主体（主人公）、客体（主角寻找的对象）、发出者（确定使命与任务，即行动者）、接受者（获得果实者）、反对者（阻碍主体行动者）、辅助者（帮助主体行动者）〔27〕之外，样板戏里面还存在着一个特殊的代码——隐身者。隐身者隐藏在整个叙事文本之中，但他不是一个具体角色，我们无法看到他的肉体、形像，只能从主体、发出者、辅助者、接受者、甚至反对者那里感觉到他的存在。这个隐身者有一个不易察觉的特点：亦阴亦阳，时分时合。其规律是：分与阳同在，合与阴并存。当他一分为二的时候，总是呈阳性——我们看到的是毛的画图、毛的著作，听到毛的语录、毛的教导；当他合二为一的时候，总是显阴性——我们看到的是红旗、红日、朝霞……，听到的是党的意图、党的指示……。

这个隐身者在叙事中的功能是决定性的，它操纵着其它代码，决定着这些代码的功能：主体是表现其万能的代表，客体是其征服的对象，发出者按其指示而行动，接受者是表现其恩德的工具，辅助者因为他的缘故才帮助主体，反对者由于他的威力而遭受灭顶之灾。总之，隐身者是样板戏的灵魂，没有它，就没有其它代码的存在基础。需要指出的是，这个隐身者并非仅仅存在于样板戏之中，在十七年的电影里，他是主宰；在新时期的“主旋律”里（尤其是在那些“献礼片”、“重点片”、“获奖片”之中），他不但健在，而且仍是主宰，只不过更隐蔽罢了。在伟大领袖已经走下神坛之后，这个隐身者并未从中国的电影中消失。

显然，样板戏实际上造了一个两面神，朝着“善男信女”的一面是伟大领袖，背着“善男信女”的一面则是执政党。前者清晰而具体，时时教导着芸芸众生；后者模糊而抽象，有意隐藏在毛的后面。肉眼凡胎的“香客”们只看到了前者，所以人间的崇拜和“香火”都集中到了他的面前。后者虽然有时——尤其文革时期——感到冷清，但却更长久也更自信。因为，它掌握着“游戏规则”，创造了一种“道”，“天不变，道亦不变”。党的代表人物可以换，但其思想体系和政治制度不能改。文革可以“踢开党委闹革命”，但绝不能离开党的领导；可以随意揪斗党内走资派，但必须把他们划入反革命修正主义一边去；可以组织各种造反派组织，但绝不允许全国性的跨行业组织存在，以免构成对执政党的威胁。凡此种种，都证明了这一先验性的原则。

样板戏“造神”遵循的是同样的逻辑，它宣传的个人迷信其实是思想迷信和制度迷信。其“造神”的深层意义是：认同思想，认同体制，放弃陈寅恪所说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成为这一思想和体制的信徒和奴仆。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所有研究样板戏的人们都站在了“香客”的位置上，只看到了两面神的一面，认为样板戏宣传的只是个人迷信、突出毛泽东个人。如此见解不但陷入了一个认知误区，而且掩盖了一大骗局。邓小平就承认：“单单说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28〕根据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邓小平所说的“制度”是指“体现为法律和政治设施的国家形式”。〔29〕这一国家形式不但“受制于社会生产和经济结构，并对意识形态的内容、发展趋向产生重要的影响。”〔30〕“一些制度不好”，也就是说，受制度严重影响的、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组成部份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按照阿尔都塞的所说的——是政治、法律、教育、传媒、家庭、工会组织、文化（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好。〔31〕它们共同制造了迷信，把中国拉向倒退。

马克思早就指出，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它的相对独立性，即与不断发展和变化中的社会存在相比，意识形态是一种滞后的、相对保守的精神力量。〔32〕这在中国表现得格外突出。农民早就有“三自一包”的要求，而这种基于农村经济结构产生的合理要求，直到八十年代初才被意识形态所接受；右派分子们1957年提出的很多重要的涉及体制的思想观点，直到八、九十年代才得以部份实行；文革前那些被批判的描写了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影片，直到八十年代才得到肯定。这些现象不是恰好证明了意识形态的保守性和滞后性吗？

中国就要加入世贸，美国大片将以更大的优势进入中国市场，保护民族电影工业是当务之急，要做的事情很多：电影需要立法、分级、类型化，需要真正地走向市场，而“去意识形态之蔽”〔33〕是这一切的前提。尽管今天的电影比样板戏高明多了，就是“重点片”和“献礼片”也在使劲地拥抱人性，但是它们与样板戏产生于同一机制，出自于同一血统。谁能保证，若干年后那些获“夏衍文学奖”的剧本或者获政府奖的影片，不被将来的电影史归入样板戏一类呢？

## 【注释】

〔1〕（法）让-路易·科莫里，“电影·意识形态·批评”，载张红军编的《电影与新方法》，第350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29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

〔3〕俞吾金，《意识形态论》，第三章及第四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4〕参见《革命样板戏评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

〔5〕郦苏元，“当代中国电影创作主题的转移”，《当代电影》，1999年第5期，第61页；翟建农，“‘样板戏电影’的兴衰：文革电影——20世纪特殊的文化现象”（一），《当代电影》，1995年第2期，第37页；王土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叙事/意识形态话语”，《当代电影》，1990年第3期，第34页。

〔6〕阿尔都塞，李迅译，“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当代电影》，1987年第4期，第105页。

〔7〕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引自许建华的“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历史考察”。该作者认为：“显然，毛泽东的这种提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反对‘一切个人崇拜’的教导，在理论上也是站不住脚的，这表明他在反对个人崇

拜这个原则问题上已经产生了怀疑和动摇。”见萧延中编：《晚年毛泽东》，第245页，春秋出版社，1989年。

〔8〕关于林彪曲意逢迎，吹捧毛的情况，可参见许建华的文章，出处同上。

〔9〕出处同注〔6〕，第246页。

〔10〕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解放文选》，第308页。

〔11〕出处同上，第310页。

〔12〕《平原作战》是八一电影制片厂1974年摄制的京剧样板戏电影。

〔13〕《马恩全集》第三卷，第537页。

〔14〕《哥达纲领批判》，《马恩选集》第三卷，第10页。

〔15〕尚瑛，“雄姿英发 倔强峥嵘——赞革命现代舞剧《白毛女》彩色影片”，《革命样板戏评论集》，第33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

〔16〕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光辉形像”，出处同上，第69页。

〔17〕吴笛，“笔卷惊涛写英雄——学习革命现代京剧《海港》的艺术构思”，出处同上，第372页。

〔18〕宋鸿华，“移植创作中的优秀成果——评革命现代京剧《红色娘子军》”，出处同上，第459页。

〔19〕出处同上，第460页。

〔20〕杜美，《欧洲法西斯史》，第18页，学林出版社，2000年。

〔21〕庄辛，《谢晋传》，第35页，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

〔22〕出处同注〔6〕，第38页。

〔23〕出处同上。

〔24〕《桥》是东北电影制片厂1949年摄制的。见胡星亮、张瑞麟主编，《中国电影史》，第247页，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5年。

〔25〕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97至98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

〔26〕此片由北京紫禁城电影公司、北京电影制片厂、青年电影制片厂摄于1996年。

〔27〕李幼蒸，《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第16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28〕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17、429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

〔29〕出处同注〔3〕，第93页。

〔30〕出处同上。

〔31〕《当代电影》，1987年第3期，第105页。

〔32〕出处同注〔3〕，见第四章“马克思意识形态学说论析”之第一、二节。

〔33〕出处同注〔3〕，第3页。

□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3期，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

【影视评论】

看凤凰卫视对叶向真的采访

• 刘晓波 •

（一）只诉苦而不自省的叶剑英之女

12月6日和13日，凤凰卫视播放了对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的采访。其中，她对文革的回忆占有很大篇幅，尽管，与我见过的其他高干子女对父辈对自己的回忆相比，叶向真的讲述

还比较实在，整体而言，没有刻意进行自我美化，但她对文革的回忆，仍然难免老一代红卫兵缺少自省的通病。

在谈到早期文革时，叶向真作为首都艺术院校造反派领袖，在当时可谓家喻户晓，但她只是极为简单地几句带过，全部叙述加在一起只有58个字，既没有交代她参加红卫兵的过程，也没有任何具体细节的叙述，而对江青整肃叶家、叶家子女因此受难的细节的叙述则详实生动，有起因、有过程，更有她自己坐牢三年的细节、体验和所受到的身心伤害，所用篇幅是5300字左右，占了一万八千多字的采访文字稿的25%以上。

因为叶剑英与江青争吵，气愤得难以自控，以手击桌折断了手指，由此得罪了江青，叶家子女的厄运随之而来，纷纷被投入监狱。她讲自己在功德林监狱中的经历，一个人关在九平米的牢房里，见不到家人，最后半年才见到家人送来的日用品和书籍；她很孤独，没有放风和其他活动，冬天的牢房冷得结冰，只好自己解闷，把扫帚上的苗种在小铁盒里，用牙刷沾水在水泥地上练字，向看守撒谎，甚至在刚进监狱时企图自杀。她的感受是：“我想不通啊，我干吗从小太阳，一下变成了个小煤球，小粪蛋儿呀，就这么一个处境，从天上掉下来，在熬不过去的时候，想死了算了，还想怎么死痛苦少一点，想来想去，都想过。”

她出狱回家之后才知道：她丈夫刘诗昆、大哥叶选平、二哥叶选宁、大姐叶楚梅、大姐夫邹家华连同一个阿姨也都被逮捕，分别关押在功德林监狱，监狱环境非常恶劣：冬天的牢房冷得结冰，“水都不给你喝够的，一天两碗白菜汤，四个窝头，就是一天。我姐夫邹家华，最后，没有地方喝水，没有足够盛水的容器，最后你猜怎么着，把胶鞋洗干净，装水喝。”因为看守们认为：“反正你们都是犯人，都是反革命，所以带着阶级仇恨，就这样。”

出狱后，她经历婚姻的破裂和一年失语的折磨：“回来以后呢，我就傻呆呆，这个时候他（叶剑英）看见我的时候，就是坐那儿跟我说了会儿话的时候，我傻呆呆，那时候，他流眼泪了。”

叶向真还特别讲到林彪倒台后，江青自知无法整倒叶剑英，就假惺惺地来叶家表示慰问，叶家人诚惶诚恐地接待，她马上让孩子叫“江青奶奶”，而革命文艺旗手江青却不接受叶家孙辈叫“奶奶”的称谓，而非要让所有人都叫她“江青同志”。江青把叶家挨整的全部责任推到林彪身上。她说：江青“来了以后，一见我爸爸，哎呀，老师呀，这个女儿受苦了，她说这些人呀，林彪他们这些人真坏呀，他不仅整你的黑材料，也成立我的专案组，也在整我的材料啊。”而以后的档案材料证明，抓叶家子女“都是江青亲自批的。”

面对这些记忆中的灾难，叶向真唯一的内疚是对家人。她说：因为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太过出名，太过折腾”和“太活跃”，给江青死盯上了，“所以就拿我开刀，当然她的目的很清楚，我是微不足道，兄弟姐妹也微不足道，只要能够把叶剑英给弄下去。”“因为我给家里头已经带来很多麻烦了，……我到现在都很内疚，……”

然而，在她自己的叙述中，从来没有告诉观众：她在文革中是怎样就“太过出名”、“太活跃”和“太过折腾”，她是否对其他人造成过伤害？自然，内疚和忏悔也就无从谈起。

众所周知，文革初期的红卫兵造反，大都是高干子弟所为，以干部子弟为主的“联动”横行北京，公然提出过“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实施过令人发指的暴行，对遇罗克之死以及众多被株连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直到现在，这些造反先锋对当年的回忆，要么是纯洁青春和理想主义，要么是父辈和他们自己如何受难，而很少提及自己的揪斗、打砸抢、私设公堂等野蛮行为，也基本不提他们强烈的夺权动机，更不会向他们的受害者表示丝毫忏悔。

文革大灾难已经过去将近38年了，但对文革的反思仍然止步不前，既在于官方的压制和封锁，更在于个体的良知匮乏，从八十年代的知青文学到九十年代的诸多回忆录，他们非但不能真实地面对自己的个人文革史，更缺乏自省精神和谦卑忏悔，反而大都是一副“青春无悔”的大义凛然！

叶向真曾经拍过轰动一时的电影《原野》，在改革以来的中国电影史上，那确实是八十年代的一部杰作。只是不知道，她何时能够以还原历史的态度把自己及其家庭的文革史搬上银幕。

（二）红卫兵遗落在天安门广场的金条

在采访中，叶向真也透露出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颇值得咀嚼品味。

文革初期，叶剑英负责北京的治安，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确保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时的秩序和安全。叶向真回忆说：老一辈对文革中的年轻人造反也挺兴奋的，“但……有一次回来，他（叶剑英）就说，糟了，就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满天安门的那个广场都是红卫兵啊。他说等到那个红卫兵都退走了以后，就发现在那个天安门广场拣了很多的金条。”

记者问：哪来的那么多金条？

叶向真答曰：“……抄家，抄到一些人的家里头，知识分子也好啊，或者过去的一些老的资本家，就是家里都有一点底儿，存有点底儿的吧，红卫兵把这些都抢来，金子沉啊，摆在自己的口袋里，一高兴，一挤，一欢呼的时候，那金条都从兜里头都掉出去了嘛，所以就拣回来好多金条，当时他就非常感慨，就说了一句，他说如果这样下去，……这个年轻人都不知道会怎么样。意思就是说，这样的一种群众运动，是不是全是好的，他在这个问题上就已经打了问号了，那我们年轻人不都这样都给搞坏掉了，是家都可以抄，是人都可以打，想干什么干什么，就是红卫兵那时候可以为所欲为，他说，看着这些金条啊，他说这把我们年轻一代的，搞不好都毁掉了，……”

想象一下当年情境：一面是向毛泽东的热泪盈眶和喊劈嗓子的欢呼，是愚昧盲目到丧失理智的狂热；另一面是挤掉在狂热人群中的金条，是贪图抄家金条的阴暗自私，二者在文革对人性邪恶的纵容上有着内在的一致：红卫兵造反就是以毛泽东旗帜进行的公开抢劫。

极权政治是所有制度中对人性戕害最狠最全面的制度，其道德激励只能是鼓励缺德者而惩罚有德者。在绝对强权之下，完全公有制和泯灭人性的意识形态灌输，使人变成了毫无自主性的奴隶，即便在人人高喊大公无私的革命狂热中，红卫兵私占抄家财富的行为与奴隶的怠工、偷懒和盗窃财物没有实质区别。再造新人之难于上青天，只能证明企图进行人性改造之人的狂妄和冷酷。毛时代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和狠斗私字一闪念的再造共产新人计划，在人的自私本性面前是多么不堪一击。今天再反复强调红卫兵造反是纯洁青春和理想主义，是为了掩盖参与者的真实动机，并寻找推卸罪责之词。文革中的人性真相，不能说全无理想主义成分，但也使人的权力欲和破坏欲有了尽情发泄的机会，对权力的贪婪和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起码是导致各派之间的相互打杀的深层原因之一。所以，“夺权”才会成为文革初期的最著名口号。

向走资派夺权也好，与封、资、修争夺上层建筑的领导权也罢；打倒高层的刘邓陶也好，让所有牛鬼蛇神永世不得翻身也罢，无论打着怎样的旗帜“夺权”，从毛泽东到诸多红卫兵头目，要的既不是任何主义，也不是任何完美人性，而仅仅是一言九鼎的自私权力！“一切向权看”才是文革的真相：对于毛泽东而言，要得是实现不断膨胀的权力野心，他要统治中国的绝对权力，

所以宁可冒着天下大乱的危险，也要清除一切绊脚石；还要充当世界领袖的绝对权力，所以宁可冒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也要扮演第三世界的领袖，同时对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于文革中的其他风云人物而言，是通过向毛泽东（最高权力）争宠来实现各自的权力野心，无论是三呼万岁还是凶狠整人，其目的皆是极为自私的：或为了个人的政治进步，或为了个人的自保，理想高调不过是自私的权力动机的遮羞布而已。换言之，在毛泽东时代，一面是意识形态的高调伪理想，是雷锋式新人辈出的宣传灌输，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厮咬的残忍现实，是揭发告密、落井下石、夫妻反目和父子成仇，是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无法无天。

难道圣洁天安门广场被几根金条玷污了？非也！金条的闪光所显示的仅仅是：任何旨在改造人性、再造新人的计划都是戕害道德的乌托邦，强制播种绝对完善的人性种子，收获的只能是极端邪恶的兽性果实。因为，这样的乌托邦服务于独裁者的绝对权力，而国人的最大不幸在于，从延安时代就开始推行这种乌托邦的毛泽东，却恰好变成了中国的毒太阳，长期超强光烘烤之下，培植人性的土壤必然变成寸草难生的沙漠。

所以，邓时代“一切向钱看”的道德荒芜化，早已在毛时代的“一切向权看”的道德沙漠化中完成，拜金主义不过是的拜权主义的变种。毋宁说，广场上那狂热的欢呼和散落的金条，就是“拜权”与“拜金”的绝妙结合。而在中国，“拜金”深层是“拜权”，因为独裁制度的游戏规则是：有权就有一切！

□ 原载《观察》，2003年12月22日于北京家中

~~~~~

#### 【人物追踪】

### 走出秦城监狱后的吴法宪

• 张 杰 •

1981年9月15日上午，因九一三事件被关押10年之久，从而名扬海内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副组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吴法宪，在几位公安人员陪同下，乘车离开秦城监狱，踏上了保外就医之路。

那年5月的一天，秦城监狱的一名管理员向吴法宪传达上级指示：“关你们都将近十年了，时间长了，将来连话都不会说了，领导决定改善一下你们的生活条件，在这条走廊上，还关着邱会作、江腾蛟、王洪文，你们在各自的牢房内，上午8点打开，晚上9点钟关上，白天你们4个人可以在一起学习，由江腾蛟任你们的学习小组长，走廊上有扑克和象棋，还放了一台电视机，可以在一起玩一玩，晚上可以看一看电视。”就这样，吴法宪同两位前同僚邱会作、江腾蛟及昔日的“王副主席”在秦城首次晤面。在此之前，还有谁被关在这里，吴法宪一无所知。

彼此都是老熟人，从外表上看，变化也不算太大，可这是监狱，环境特殊，谁知道哪个旮旯里装着窃听器？心存疑虑，说话谨慎也就在所难免。相形之下，邱会作最热情，几次拉吴打扑克，这不奇怪，从长征时的一方面军、抗日战争的新四军、解放战争的四野，直至“文革”中的军委办事组，论思想，道感情，俩人都是一伙的；江腾蛟也是老红军，还是老部下，文革中吴法宪为了保护他，可没少伤了脑筋。江腾蛟几次向吴表示歉意，吴法宪说咱都这样了，算了吧。王洪文也向吴法宪道歉，说他主持军委工作期间，搞了不少吴的材料，有不实之词。吴法宪说：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对我来说，无所谓。当年我们打仗时，你还是个孩子，一下子当了接班人，主持党中央和军委工作，这个台，你压得住吗？王洪文说：想到这些，都已经晚了。

牢房里无蚊帐。王洪文年轻、个子高，每天傍晚站到吴法宪的铺板上，用拖把帮他打房顶上的蚊子。多少带点补偿的意思。乍暖还寒的天气，王洪文时常头痛，甚至从床上摔下来，为了防止他跌伤，狱方在他的房间铺了块地毯。此人从那么高的职位落到这般地步，说来也怪可怜的，这里面当然有咎由自取的成份，可完全怪他，好像也不太公平。这是一个非常时期的畸形产物。

8月的一天，公安部来了一位副部长，先找邱会作、江腾蛟，又与吴法宪谈话：中央已经决定，将你们放出秦城，各自安排一个地方保外就医。安置你的地点是在济南，到了那里可以和陈绥圻住在一起，还可以带一到两个子女照顾你们的生活。现在正在为你的保外就医做准备工作。过一段时间你就可以出去了，为了保障你的安全，到了济南可以改一个名字，至于改什么名字，你自己考虑一下。

总算盼到这一天，吴法宪非常高兴。名字好改，就叫吴呈清，那是他原来叫过的名字。

8月5日上午，管理员通知吴法宪，下午家属来探视，陈绥圻也来。十年没见妻子面了，不知她变成什么样子。

坐立不安盼到了下午，经过重重铁门，吴法宪来到接见室。一位青年男子连忙迎上来，吴法宪问：同志，你是谁呀？爸爸，您不认识我了？长子新潮泪流满面十年不见，陈绥圻老了许多，人显得消瘦，头上添了不少白发。7月20日，陈绥圻离开农场到上海，原想在她哥哥陈子圻家多住几天，得知5日下午可以探视，赶在4号回到北京回到牢房，邱会作和江腾蛟兴奋地告诉吴法宪，胡敏（邱会作夫人）和李燕平（江腾蛟夫人）都来过了，邱会作去西安，那里是胡敏的故乡。江腾蛟被安排在太原。王洪文已被送进医院，说是为他治病，其实是怕他看到别人都走了，撇下他自己，神经受刺激。狱方考虑得挺周全。

几天后，陈绥圻和金平原（吴的女婿）又来到秦城，将出狱后的具体安排告诉了吴法宪。

一、由吴的女儿金秋随秦城监狱警备大队的苗政委到济南看房子。

二、1981年7月9日，胡耀邦总书记批示，对陈绥圻的问题要重新结论，空军表示要尽快作出结论。陈绥圻准备在北京等一等。先由四女儿巴瑾陪吴到济南住一个月。

三、陈绥圻离开浙江绍兴农场的时候，行李没有带出来，由金平原到绍兴农场把行李运到济南。

四、吴法宪每月的生活费100元。陈绥圻的生活费也提高到100元。关于安家，公安部可以给一点家具，孩子们凑了一千多元，买一台彩电送到济南，调剂一下生活。

陈绥圻嘱咐吴法宪，耐心等待，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在一起生活了，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对将来的生活要有信心。

大约是9月7日（也可能是8日），邱会作首先出去了，吴法宪有点急，怎么还不来接我呢？终于来了通知，15日动身去济南，要他去清点一下入狱时扣押的物品。东西一样不缺，吴法宪又戴上了多年没有戴过的手表。只是所有的衣物都被虫子咬得稀烂，再也不能穿了。

45次特快正点驶离北京站。吴法宪和巴瑾坐一个软卧包厢，按公安人员嘱咐，吴法宪不能随便走动，中午饭会送到他的包厢里来。



绿色的原野，金色的河流，多少年没见到人间景色了，看着车窗外不断掠过的田野和村庄，吴法宪感到，自己又回到了这个世界上。

下午四时许车到济南，山东省公安厅的一位处长和济南市公安局的赵科长来接站，把父女二人送到济南南郊的七里山小区。新居位于一座居民楼的二层，两室一厅约四十多平米，床、桌椅板凳、锅碗瓢勺、蜂窝煤炉子，还有一套煤气灶，必要的生活用具已经配齐。看来花了不少钱呢，吴法宪心想。赵科长带着巴瑾去买了些米和蔬菜。又拿出150元，算是预支一个半月的生活费。

第二天，北京来的公安人员都回去了，临走时交代吴法宪，有事找赵科长联系，一切由他负责。医疗关系安排在省公安厅劳改局医院，这个医院很近，看病比较方便。

没有了高墙、电网，没有了重重铁门和带枪的卫兵，只有女儿在身边，吴法宪终于相信，他真的是自由了。

从15岁参加红军开始，吴法宪过的就是集体生活。官越当越大，饭有人做，水有人烧，到哪都有人跟着。直到进了监狱。

他饭不会做、水不会烧，分不清人民币的圆角分，更不知怎样使用煤气灶，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多亏巴瑾买菜做饭洗衣搞卫生，不然的话，这日子真不知道怎样过。

两天后，吴法宪随赵科长到医院检查身体，没想到很快被人认了出来，好奇的群众把他和赵科长围了个水泄不通，赵科长急了，大声呼喊着，奋力挤开一条路，好不容易把吴法宪和巴瑾送上了车。

有了这次教训，吴法宪白天基本上不下楼，只在清晨及天黑后，才和巴瑾到室外活动活动。偶尔在阳台上甩甩手（80年代盛行甩手疗法），下面也有不少人在围观。人们要么笑笑，要么点点头，但是不敢说话。

10月上旬，新潮和金秋送来一台十四英寸彩电。新潮正在办转业手续，准备来济南照顾父亲。彩电是用他的复员费买的。从此，看电视成为吴法宪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从你好到再见，一直看到预告第二天节目。

赵科长恪尽职守，每隔几天就来一次。11月11日，陈绥圻在拿到对她的审查结论，并交出一份书面意见后也到了济南，见到陈绥圻，赵科长很高兴：你来了我就放心了，照顾老吴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12月9日，赵科长向吴法宪传达了保外就医期间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可以和家人通信，可以在家里会见亲友。

二、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在济南市活动，外出的时候要有家属和子女陪同。

三、未经允许，不得探访亲友，不准离开济南市。

四、不准和外国人交谈、接触和通讯。

五、看病不要到医院去，由医生出诊，住院的时候，要有家属护理，没有家属护理时，由公安部门派人护理。

此外，配发的家具要登记。

除了看病要医生出诊，以上几条，吴法宪都严格地予以遵守。医院的大夫工作忙，每次都要求人家出诊，确有困难。

吴法宪学会了做饭、烧水、生炉子，有时还炒几个菜。买菜、倒垃圾、打扫卫生，基本上也被他承包了。老俩口精打细算，买一斤肉分成十块，每次吃一块。月底收支大抵相当。日子过得不富裕，可也说得过去。关键是看跟谁比。

很快就到了1982年的元旦，北京的几个孩子、潍坊的采芹、上海的陈子圻一家都提出要到济南一起过春节，老俩口一算，一共是17口，吃、住都是问题。

难题报给了赵科长。赵科长从公安局招待所租来被子，又借来凳子和铺板，两间房子分成男、女宿舍，搭成通铺，至于吃的，各家自带一点，再买一点。

春节前两天，各路人马到了济南。采芹从潍坊带来一架录音机，年轻人说呀笑呀，闹个不停，晚上跳起了交际舞。

人生有艰辛、磨难，但更多的是希望。看到年轻人的活泼、乐观，吴法宪忘记了自己还是一个保外就医的囚犯。

出狱后的第一个春节，深深地印在吴法宪的脑海中，难以忘却。他暗暗地想，过去的，就让它像梦一样过去吧。

人老梦多。且天马行空，千奇百怪。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法宪的女儿金秋博士给笔者讲了个故事。听着有点像天方夜谭。时间：2001年7月；地点：某医院吴法宪病房。

清晨，从梦中醒来的吴法宪，睡眠惺忪，嘴角挂着一丝微笑。他告诉女儿，自己做了个怪梦：刚刚接到总理电令，毛泽东主席南巡即将归来，要他立即陪总理去机场（好像是西郊机场）迎候。

“那不可能，主席不是早就不坐飞机了吗？”

“是呵，是呵……我还奇怪，我都这样了……怎么能陪总理去接主席啊？可我……可我……我真高兴啊……”

黑色幽默。说着说着，老人流泪了。

女博士一脸苦笑：你瞧，他就是这样的人，都‘这样了’，也改不了。

有人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更有人说：高处不胜寒，还是人间好。

电视机里，港台肥皂剧紧锣密鼓，年轻人看得如醉如痴；老人耳背，鼾声骤起，吴法宪又一次进入他的梦里水乡。

街坊邻居对吴法宪都很好，吴大爷吴老头，叫啥的都有；也有哪壶不开提哪壶的，猛不丁来声吴司令，别，别，可别这么叫，吴大爷连连摆手。副食店的营业员对他挺照顾，挑好菜给他留着。用不着排队，看他来了，有人会喊：让老红军先买！家里的水龙头、门锁坏了，自有邻居义务登门服务；每次买蜂窝煤，邻居们主动来帮忙，一块块帮他们搬上楼。

一天，吴法宪到商店买了条棉褥，扛在肩上，沿着马路慢吞吞地往家赶。一青年见状，二话不说夺过棉褥换到自己肩上。吴法宪急了，光天化日之下，你怎么抢我东西？那青年赶紧解释：我可不是抢东西，看你这么大岁数，我帮你送回家去。

凡此种种，老两口深受感动。中央文献研究室来人外调，问吴法宪在济南生活习惯不习惯，吴说：我感觉比北京好，山东人大多憨厚、豪爽、仗义、好交朋友。有人情味。济南山好、水好、人更好。来济南真是来对了。

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吴法宪，在红军中已算得上知识分子。尽管毛笔字也就是描红水平，但行军路上刷刷标语已非他莫属。这为他晚年潜心钻研书法打下了基础。新潮转业后，被安排在艺术学院工作，他为父亲买来笔墨纸砚，还介绍了几位书画界的朋友，与父亲相互观摩、切磋。吴法宪的篆书技艺大进。始料未及的是，本为修身养性、强身健体，却引来众多慕名求书者，更有人携其墨宝远渡东瀛，以50万日元的价格出售。济南书画市场上充斥利欲熏心者精心制作的赝品，居然不愁销路。对此，吴法宪倒颇有自知之明，多次不无自嘲地对人说：我的字并不好，是我有‘名’，‘臭名’远扬啊。

人老了，也有犯糊涂的时候。

起来起来，赶紧调车，蒋介石的飞机进来了，我得赶紧去指挥所。

那年住院，趁陪床的儿子睡着了，吴法宪跑到走廊上，挨门挨户敲人家的病房门。180多斤的体重，连拖带抱，好不容易，新潮才把他弄回来。

也许是白天睡多了，夜半三更，吴法宪硬要病友、山大校长吴富恒陪他谈心。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第二天一早，人家赶紧出院了。

儿子把我卖了，把我卖给你们医院了，他太坏了，不让我回家了。老人伤心地向大夫、护士嘟囔着。

应该说，吴法宪的晚年生活是平静而幸福的，这首先要感谢党的政策，另一方面，吴法宪的妻儿对他照顾的无微不至，特别是吴夫人与吴的感情很好。

吴夫人陈绥圻原籍浙江余姚，家道小康，自幼在上海长大，就读于怀久女子中学，1940年，经同学介绍在该校入党，1941年6月到苏北参加新四军，被分配在吴法宪任主任的三师政治部下属的锄奸部（后称保卫部）任内勤干事。1942年春，吴法宪在政治部全体干部会上传达新四军军部《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给19岁的陈绥圻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是她

第一次见到吴法宪。

不久，政治部举行晚会，吴法宪也在场。同志们要陈绥圻唱歌，她只得从命。没想到引起了吴法宪的注意。27岁的政治部主任还是单身汉，好在近水楼台，瞅空便来关心关心这位上海姑娘，顺便介绍介绍自己的家庭及个人经历。一些首长和同志看出了苗头，也往陈绥圻的耳朵里吹风，两人逐渐熟悉起来更具体的细节不知道，没法写；问倒是问过，老人笑吟吟地不说。再问，还是笑吟吟的，还是不说。

战争年代，谈恋爱也像打仗，讲究速战速决，1942年10月，陈绥圻和吴法宪在三师政治部驻地、苏北阜宁县的戴舍结婚。

吴法宪那时叫吴文玉，1915年出生在江西永丰县龙冈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毛泽东在他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一词中写道：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龙冈就是吴法宪的家乡。吴法宪就是在第一次反围剿的战斗中参加红军的，当时只有15岁。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那时是乱敌人，乱白狗子，乱蒋委员长。越乱越好。到了文化大革命，可就净乱自己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受挫，被迫开始长征。留在苏区的红军亲属备受株连，处境凄惨（50年代，根据王愿坚的小说《党费》改编、田华主演的电影《党的女儿》应是那段历史的真实再现。笔者小时候跟同学一起看过多遍，一个个感动得小眼通红）。

吴法宪的家人被白军驱赶到荒山野岭，凄风苦雨中，祖母、母亲、两个弟弟、三个妹妹饥寒交迫相继去世，剩下老父亲孤苦伶仃，靠挑担子贩卖烟叶谋生。

1938年，吴法宪和彭明治（建国后曾任驻波兰大使、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1993年去世）率六八五团（后编入八路军五纵队）东进到山东微山湖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时，曾给家中去信，不料信落入敌人手中，父亲因此被捕，多亏好心的邻居凑了十几块银元将老人赎了出来。1949年，四野十三兵团南下广西时，老父亲尚健在，吴法宪正欲将老人接到南宁颐养天年，收到军委电令，要他进京参与组建空军；途经武汉，吴法宪向谭政请假，要求绕道江西探视父亲，终因军务紧急未能如愿。孰料到北京不久，便接老家来信，父亲因染上痢疾于数日前病逝。

1960年春，吴法宪去广州参加军委扩大会议之后，回到龙冈。这是他离家30年，第一次重返故土。老宅早已变成了农田，只得借住在生产队的仓库里。吴法宪找来锄头，流着泪，轻轻地为亲人除去坟头上的萋萋荒草，恭恭敬敬，鞠了三个躬。

苏北的盐阜地区曾是中共华中局、新四军军部驻地，又是三师师部所在地，向为日军所瞩目。1943年1月中旬，日伪军几万人轮番出动，完成了对盐阜区和国民党韩德勤部所在的淮安以东地区的包围，形势十分严峻。新四军军部秘密转移到了淮海區黄花塘，三师部队则化整为零，分头开展游击战。师部决定，所有家属实行疏散。当时，师长黄克诚的夫人唐棣华、副师长张爱萍的夫人李又兰、苏北行署主任曹荻秋的妻子汪云都身怀有孕，行动不便。考虑到陈绥圻家在上海租界内，相对安全，师领导决定，由陈绥圻和师政治部副主任杨光池的夫人孙红陪同三位孕妇分赴上海，到陈家隐蔽待产。还算幸运，顺利抵达上海后，唐棣华、李又兰（好像又回了老家宁波）相继安全分娩，母子平安。形势有所缓和后，她们先后回到苏北。只有汪云因难产死在上海的一家医院。陈绥圻那时还没有孩子，是最早回到部队的一个，时间大约是1943年的秋末冬初。陈绥圻记得，她找到部队的那天，吴法宪正在师部开会，听说妻子回

来了，午饭也没顾上吃就赶回了政治部。

反扫荡中，吴法宪也遇到过险情。一天，他和曹荻秋在新洋港附近同日军突然遭遇，一排子弹打来，左右两名警卫员当场牺牲，他和曹荻秋侥幸脱险。

战争中的每次分离，都可能是永诀。劫后重逢，两人悲喜交集。

回到苏北后，陈绥圻才知道三师出了大事：师参谋长彭雄、旅长田守尧奉命去延安学习途中，与日军在海上遭遇，不幸牺牲。这是三师，也是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损失。听到这个消息，陈绥圻心中十分悲痛。彭雄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新四军杰出的军事领导人，很受黄克诚的器重。彭雄和吴法宪朝夕相处，私交甚笃。1941年秋，吴法宪和彭雄从三师自行车队借来自行车，拍下一张合影。彭雄在照片后面写道：这是大胖子与我出洋相吧，好，送你留念一片，我也有啊。弟彭雄十一月十九日。这帧留有烈士墨迹的照片，吴法宪一直珍藏到今天。

据说，刘亚楼生前，曾这样议论他的胖政委：吴法宪找了个好老婆。

据说，叶群对陈绥圻的评价是：贤妻良母。

据说，秦城中的吴法宪，念叨最多的是：你们能不能让我见见陈绥圻呀，我对不起她呀！能被丈夫如此叨念的女人，那是一种幸福。

九一三后的陈绥圻，从隔离审查到劳改农场，经历了10年蹉跎。

1981年8月的初，陈绥圻从浙江绍兴龙虎山茶牧场回到北京，回到位于广安门的家。两案办公室通知她：中央已有了批示，他们会抓紧时间办理。他们还告诉陈绥圻，以后她的生活费每月提高到100元。

这次，陈绥圻领到了200元，为两个月的生活费。

第二天一早，梦瑾满脸兴奋：昨晚上我高兴得没睡着觉，这么多年了，没见过这样多的大票子（当时人民币最大面额为十元），妈妈，我们去买点香蕉吃，行吗？

香蕉买回来了，僧多粥少，一人一个。陈绥圻一阵心酸，说：先尝尝吧，等以后条件好了，咱再多买。

1988年，空军纪委对陈绥圻作出《犯了严重错误，给予留党察看两年的处份》的结论，党籍同时恢复。

1992年8月，空军直属政治部转发关于《陈绥圻同志离休的通知》：陈绥圻按副师职离休，离休时间从1988年算起。

进入90年代，中共山东省委为吴法宪调整了住房，一幢独门独院的小楼。居住条件大为改观。医务部门为患有多项老年病的吴法宪提供了良好的保健医疗。老两口由衷感谢党中央的关怀，衷心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为改革开放后中国面貌的日新月异，为历尽劫波的我们党和国家，终于走上一条实事求是、富国强民的康庄大道而倍感欢欣。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吕青（加拿大）                    熊波（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 //www.cnd.org/](http://www.cnd.org/)

---